

史学选译

纪念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专号



1990

(总第17期)

封面设计：赵世瑜

本期责任编辑：郭小凌

编辑：北京师大史学选译编辑部
印刷：北京师大印刷厂
订购发行：北京师大历史系
（内部交流）
出版日期：1990年10月30日
本期字数：315,000字
本期印数：1000册
定价：6.00元（成本费）



史学选译 1990年(总第17期)

纪念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专辑

目 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鸦片战争问题的论述选辑

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 1

史革新集录

论著选译

鸦片和走向战争之路..... 4

选译自E·V·卡利克《彼得·伯驾与中国的开放》

莫金莲译，张绪山校

教士外交家郭士立与鸦片战争..... 20

选译自李齐芳主编《中国近代政教关系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G·路兹原作

李英桃、李树杰译，郭小凌校

《中国的战争》一书导言..... 52

小斯蒂芬·乌哈利原作

黄安年译

鸦片战争 辞条选译

1. 西方的挑战 (1839—1860) 57
2. 鸦片贸易 64
3. 鸦片战争 (一), (二), (三) 67
4. 林则徐 (一), (二) 73
5. 魏源 77

以上译自《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李佶译, 黄安年校

6. 英中战争 78

译自《苏联历史百科全书》

朴久富译, 张文淳校

文献资料

英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关于对华贸易的报告

并证词备忘录 80

译自《英国议会档案》第30卷

证词前部分 81

阎荣素译, 黄安年校

小詹姆斯·威廉·弗雷什菲尔德证词 (1840.4.30) 88

李红梅译, 黄安年校

罗伯特·英格利斯证词 (1840.5.9, 5.11) 89

李红梅译 (No.1—161), 阎荣素译 (No.162—392)

战葆红译 (No.393—594), 蒋加明译 (No.595—779)

黄安年校

约翰·撒克船长证词 (1840.5.11.5.14)	217
蒋加明(No.780—813), 尹忠良(No.814—1083)译, 黄安年校	
安东尼·丹尼尔证词 (1840.5.14)	262
尹忠良译 (No.1084—1102), 黄安年校 黄传霞译 (No.1103—1338), 郭小凌校 梅雪晴译 (No.1339—1463), 张文淳校	
威廉·查顿证词 (1840.5.18)	313
梅雪晴译 (No.1464—1521), 张文淳校 薛冰译 (No.1522—1722), 杨共乐、韩秀芳校 赵丽萍译 (No.1723—1840), 张文淳校	
詹姆斯·马尔科姆逊证词 (1840.5.18.6.1)	370
赵丽萍译 (No.1842—1924), 张文淳校 赵丽萍译 (No.1925—1938), 刘北城校	
阿达希·库尔塞吉证词 (1840.6.1)	389
赵丽萍译 (No.1939—2136), 刘北城校 刘少华译 (No.2137—2370), 刘北城校 张锋译 (No.2371—2452), 赵世瑜校	

书 目

论及鸦片战争的中文图书目录	449
1. 大陆部分	449
范乃强辑	
2. 台港部分	454
黄安年辑	
补白:《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已付排	7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鸦片战争问题的有关论述

我们只要熟悉一下英国第一次对中国进行的战争，也就是熟悉一下昨天发生的事件就够了。当时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由于受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引起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载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

——马克思：《印度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09页

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

——马克思：《中国记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空气，可是他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

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做野蛮人看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如果中国人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怯行为，那么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一般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

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3页。

从一八四〇年林则徐烧鸦片起，中国革命了一百一十年。……从一八四〇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一十年搞了什么？就搞了个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就是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政府。可是生产关系还没改，改变生产关系还只是最近几年的事。

——毛泽东：《接见参加联合国学联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转引自1957年2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史革新集录）

鸦片和走向战争之路

E · V · 卡利克

对这位外国人而言，在中国生活需要他有顽强的适应能力。1835—1838年医务活动的展开要求伯驾医生适应中国的环境，适应中国那令人振奋的行为心态，卫生设施的不便和匮乏；适应那神秘而陌生的广州烟馆文化；切实符合于福音主义新风尚的准则。此外，1839—1840年事态的发展急需调整政策，以中英商业战争的爆发，克服随之而来的广州沿海外国侨民的严重混乱。

如前所述，华夷之争由来已久。闭关自守的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直限制和隔离伯驾，中国的对外审判权困扰着他，使他屈从于让人生气的臣属关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外商利用麻醉剂贸易克服了这一形势下的根本困难，使鸦片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进口商品之一。

鸦片贸易的增长原因是非常简单的。十七世纪，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商人开始同中国交往，对他们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是中国市场的奢侈品——丝绸、瓷器，还有种类繁多的逗人喜爱的精制茶叶。他们垂涎于这些东西，同时却苦于无中国所需商品用以交换，因此外商日益趋向于把鸦片从印度和近东转运到中国。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中国商行每

年进口鸦片30,000多箱，每箱重远远超过100磅，总价值约为15,000,000磅。

抽鸦片烟，会上瘾成癖，且有诸多坏处，但作为吸毒形式之一其危险性是较小的。如果吸食者只限于吸入他的身体能承受且质量好的鸦片，那么也许不会产生多少不良后果，他会感到有充沛的精力处理日常事务。抽鸦片微微过量，他会觉得头脑非常清晰，精神大振，面对困境能镇定自若，自信能极好地完成各项任务。但随之而来的是疲乏和懒散，实际上意味着，他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学业依然没有完成，诗行依然没有写下。

即使用心良好，审慎地涉逐于其中，那么一个抽鸦片的人所需的（烘焙的鸦片烟丸）“口”数总是逐年递增的，最终他将不可避免地浪费大量的光阴、钱财和精力，这对没有丰富财源的家庭来说，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而且，对吸鸦片成瘾的人来说，抽吸过量就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严重的吸鸦片成瘾可能导致最悲惨的结局，对此，伯驾医生已不止见过一例，吸鸦片成瘾者如果不及时抽吸鸦片，他就会开始打呵欠，眼泪直流，同时他很快就变得精神涣散、手足无措，如果拒不给他鸦片，他将经受难言的痛苦。要戒烟避免这些灾难，一个抽鸦片的人可能发现自己变得毫无责任心，不顾面子，毫无荣誉感，不关心家庭。从公众观点看，吸鸦片者是脆弱的，消极的，他的鸦片需求可能正好是生活放荡、腐败和走私的基点——这正是中国的实情，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人口集中之处，那里是毒品贸易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滩头堡。满清政府，未能止住鸦片贸易的蔓延之势，后来在土地税盐务管理司、黄河治理司和满族各旗中都有人开始抽鸦片。

尽管这一切让人焦虑不安，但北京政府迫于压力有理由采取放任自流的鸦片政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鸦片吸食者总数可能不多于10,000,000人（据1834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人口超过了400,000,000），而且大部分鸦片吸食者都集中在远离京城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而且，皇家侍卫和紫禁城宦官中的吸鸦片成瘾者对鸦片贸易的增长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清朝宫廷希望能从广州贸易中获利，每三年任命一位新的粤海关（Hoppo）视察广州边防物资商的活动。此时的贿赂行动还有如节日的焰火使宫廷生活活跃异常。在广州，财力雄厚的外商参加了鸦片贸易，运用自己的能力和专长完成了维持和扩大鸦片贸易。

鸦片问题、司法权问题、涉外限令的失效和腐败成了广东人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曾在几十年内令人满意地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地被掌控着，由此而出现的形势从未显得特别险峻。但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因素打破了原有的协调。

1834年，英国中止了东印度公司在英商中经营孟加拉与华南间鸦片贸易的垄断权，以及它作为英国臣民与中国官方中介人的地位，推动英国政府取而代之，英国设立了一个新官职：“驻华英商对华贸易商务督办”，拨一支小型分队归他指挥，以增强其命令的说服力，保证与中国当局的平等关系。因此在政策上他们也相应地作了至关重要的调整：从适应过去那种建立在不平等关系基础上中国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开始追求建立纯西方人目标，即理论上平等的国家间的条约关系。在中国人看来，1839年的商务监督义律上校，好象是一个完全不守规矩的人，他不完全是一个行政官员，也

未被中国人指控为走私贩，但他的工作似乎主要是保护鸦片走私贩的利益。

跟随这些变化和日益增长的鸦片贸易而来的是：为偿付鸦片款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到1836年北京政府就鸦片问题进行了一次详尽的调查，包括对这种可能性的调查：既然只要还存在鸦片走私白银就将外流，那么能否允许以实物易货方式进口鸦片并按药物收税，道光皇帝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838年夏，道光皇帝接受了两湖总督林则徐的奏章，林则徐已在省区实施禁止鸦片贸易的有效措施。审阅后道光皇帝在宫廷召见了，他，派遣他为帝国钦差大臣，给予了他在广州鸦片贸易荆棘中开辟出一条通道的无尚权威。毋庸置疑，林则徐才智非凡，对清帝国的许多地方和问题他有广泛的阅历，虽然他未在广州任过职。总之他代表着旧制度中的最优秀分子。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建立了大本营，距伯驾医生的医院相距不到半里地。费时一个多星期研究了形势后，他开始实行一系列旨在清除鸦片贸易的有力措施。他下令收缴鸦片，命令外商具结声明嗣后来船不得夹带鸦片，警告行商如有违抗处以死刑。林则徐认为，鸦片走私贩与洋馆附近小巷的中国店主有密切联系，这些商店是鸦片走私的滩头堡。因此他暂时停止了一切贸易，3月21日派兵包围洋馆，此处距彼得·伯驾（Peter Parker）的寓所几乎不到一分钟的路程。

林则徐可能很快就对经营和不经营鸦片贸易的商行作了区分，然后允许后者继续进行贸易活动。伯驾医生的朋友，奥立芬（Olyphant）和金（King）经营了这种商行，可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林则徐——为了尽快解决问题——

一既没有作出区分也没有按区分标准办事。由于外国商人至期不奉命，林则徐停止了所有的贸易；撤回了外商机构中的中国船员，买办工人和仆役；并警称长期冻结对外贸易。许多商行北面的门和街道入口都被中国人用砖堵死了，中国水师的船呈三层弧形布置在洋馆前的河面上，义律上校此前到了澳门，这时冒着风险穿过封锁线返回了广州，充当了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主要敌手之一，尽管他亦曾被迫配合林则徐的措施，命令英商向林则徐缴出鸦片，其总数多达20,000箱。

1839年眼科医院的命运与中英关系的恶化密切相关。1838—1839年度的冬季，医院满员，非常繁忙，医院从未象1839年3月份鸦片危机发生前这么“繁荣”过。但3月下旬对外国侨民的普遍限制，街道入口的围堵，使几年以来伯驾医务工作所用的那一部分Fung-tae商行紧闭了。各界多次要求医院重新开张，但在1839年毫不例外地都遭到了这个老资格行商的拒绝。然而后者允许伯驾有限度使用考克斯和安德森医生放弃的诊疗所，他们两人已经撤到了澳门。在较小规模上伯驾仍继续这项有用的实践，各级行政官员、军官和一些妇女都暗中争取得到这位美国医生的治疗。威严的礼部是古老的正统观念的大本营，但甚至曾有一位礼部官员也想得到伯驾的治疗，而且伯驾还得到了中国官方高层人士支持的私人保证，尤为重要的是钦差大臣林则徐较好地处理了伯驾的医务实践工作，他甚至好象是伯驾的一个病人。在鸦片纠纷的高潮时期伯驾失去了他的医学学生，但后来中国当局允许他们返回。有几次，当有疑心的中国官员加紧搜查时，伯驾被迫设法隐藏他所有的中文书籍。

医务实践的减少使伯驾有时间自由地休息放松自己，当

伯驾享受不情愿的闲暇时，钦差大臣则完全忙于应付日益增多的问题。在林则徐看来，查顿（Jardine）和颠地是非常狡猾的歹徒；西方人在中国领土上就应该服从满清王朝的法律；严格说来，对外国鸦片走私贩应处以死刑，但出于特别恩惠，仅只令其上缴鸦片，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但麻烦的是：尽管政府授与林则徐极大的权力，但他必须服从朝廷的错误旨令，其中有一圣旨专令当众销毁所有的鸦片，虽然事实已经证明禁令的效力应取决于鸦片吸食者的逐渐减少，而这一过程应需要大量鸦片。林则徐毫不犹豫地执行了销毁鸦片的旨令，在鸦片残渣倒入大河之前，他的确为沿海地区居民的生命安全考虑过。收缴和销毁鸦片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是巨大的。

尽管形势逐渐恶化，但还存在着很多偶然因素，这是一种让人逐渐绝望的形势，对此阿瑟·韦利（Arthur Valey）在他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一书中作了很好的说明。有人观察到：在形势非常紧张的日子里，林则徐患了花粉热病，为了镇定自己，他写作诗歌，贪婪地阅读《京报》（the *Peking Gazette* 古称邸报、邸抄）了解科举考试的情况，习练书法，参观当地著名的五桂山庙（*Temple of the Five Genii*）研究其碑刻铭文。他更为重要的活动有：整顿广州防务，与商船队长库安（Admiral kuan）会谈，同义律上校长期互换函件，频繁地向北京宫廷呈送奏折。林则徐三月要求的具结，用洋泾滨英语标为“正确自愿的契约”——引起了许多摩擦。1839年下半年有五十多艘外国商船船长确实签署了保证书，很多人好几年都遵守诺言，但几乎所

行英商都拒绝具结，因此林则徐最后停止了所有中英贸易形势急剧恶化。五月林则徐通知英国人退出通道，义律命令英国人撤至澳门。

7月初，林则徐正努力清理北京朝廷限制鸦片贸易的新规定，一场非常不幸的杀人事件发生了，在九龙，当地中国人和一伙英美水手，可能由于酒醉发生了争吵，一个叫林维喜的人，在争斗中遭致重伤，第二天死去。尽管立即进行了调查，义律不肯承担责任，他决定对五名水手处以罚款，把他们遣送回国判以短期监禁（他们回国后，英国政府不会予以执行）。这一决定是林则徐不能接受的，他严令义律交出凶犯，按照中国集体承担罪责的惯例，找出首犯。义律拒不交凶激怒了林则徐，钦差大臣林则徐遂下令撤回居澳门英人家庭的仆役，警告而且最终断绝其食物供应，并通过葡萄牙总督平托(Pinto)对英国对手施加压力。杀害林维喜是一起恶性的案件，中国最终未能逮住被控告的英国水手，（中国人损失了四艘舢板船），8月全部英人被迫从澳门迁至香港，虽然这次迁移给他们提供了避难所，但它意味着他们仍然依赖中国大陆的食品供应，林则徐断绝其食品供应的想法导致了又一次小型的海洋冲突，结果再次造成恶性事件。

然而危机升级的步伐仍是缓慢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甚至还取得了一些成功。十月中旬，林则徐得知托马斯·库茨号（the Thomas Coutts）（中文书中又为“担麻士葛号”）船长沃纳（“弯喇”）（Captain Warner）拒绝执行义律的命令，下令具结保证不再运鸦片来虎门和广州。10月底第二艘英国船罗亚尔·萨克森号（“撒克逊”）（the Royal Saxon）具结作保。虽然取得了这些新成就，他的错误却

日益增多。在1839年9月28日的告示中他声称要“彻底消灭英人”，一个月后他又重复了这一威吓，宣称中国已经准备好了人力和船只。1839年11月2日，英国的二十八炮护航舰、沃里几（Volage即（“窝刺疑号”）和海阿新斯（Hyacinth）号开到了the Bogue东面的穿鼻洋（Ch'uen-pi），距中国水师仅8哩之遥。3日，沃里几（Volage）号舰长史密斯（Smith），竭力阻挠罗亚尔·萨克森号进入虎门进行正当贸易，以防它破坏义律的战略布署，因此越过舰首向中国水师开炮。当中国水师保护还未进口贸易的英商船时，沃里几号开炮来攻。虽然中英分歧很多，但在随后的协议中英国两艘护航舰给中国水师规定了行动路线。虽然这是一次需要精确分析和报告的战斗，但林则徐没有向北京朝廷仔细地汇报这一战役，从中国方面看，穿鼻洋之役（发生在1839年11月3日）似乎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中英危机就再也无可挽回了。

实际上，英国早已作出了派遣一支远征军封锁广州的决定。伯驾的朋友威廉·查顿于9月回到英国，不久就向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了派兵建议，敦促他于10月18日写信给商务督办义律，告知英国将派出远征军封锁广州。实际上，发动战争的决定是由巴麦尊·查顿、义律和其他几个人作出的，没有提交英国国会和民众讨论。

1839年6—8月，正是中英关系恶化之时，彼得·伯驾与钦差大臣林则徐有过几次间接联系，始于1839年6月10日讨论会上与林则徐的三个密使的接触。他们详细研究了地理，主要由于一个中国人对地理的好奇心理。当伯驾提议随林则徐意愿订购一本地图集、地理书和一个地球仪时，那代表提出

要写出草约要点：伯驾医生把他的提议和申请一式两份，伯驾认为这一要求荒谬可笑，他认为责任不在他这一方。提议后来被采纳了，并且保证说钦差大臣将给伯驾医生写信，发给他通行证，以便面见。当时林则徐正在虎门的下游。

伯驾与林则徐的密使的会晤引起了浩官的强烈干涉。他请求伯驾——如果伯驾将来有机会与钦差大臣林则徐会晤——把话题仅限于医学或政治上无害的题目如外国风情，他说“你不懂贸易，也不懂鸦片船只。”尽管浩官轻蔑林则徐，但他可能用计成功地阻止了伯驾与林则徐的会晤，因为原本临近的接见似乎取消了，从伯驾的日记看，六星期后林则徐的要求是通过浩官转达给伯驾医生的。

当时请伯驾医生是为两个目的，询问“治愈所有鸦片吸食者的药方”及有关治疗疝气的意见。伯驾呈送了有关鸦片对人体的影响及治疗方法的说明书；后来林则徐希望伯驾能给他提供一种“治疗鸦片吸食者的特效药”，“能对所有的吸食鸦片的牺牲者，不论年龄、性别及患有各种鸦片烟附带引起的疾病的。都有效的药方”。但伯驾医生告诉林则徐，没有能迅速治愈鸦片吸食者的药方，他希望是不能实现的，只有通过逐渐减少鸦片吸入量来戒烟，这一复杂过程一般需要两个月至两年的时间。

伯驾还呈送了关于疝气的说明，指出他有一套可用的医学仪器，但是必须施之于病人本身，对此，林则徐迟迟未予答复，最终钦差大臣林则徐成为了伯驾医生的6565号病人，但只是由其代理人代替。为了避免与医生过于接近，他首先利用一个官员和高级行商作为替代人。后来，大约在1839年